

考古学的初心是爱国

——读王立新教授《中国考古学史教程》有感

孙庆伟

王立新教授的大著《中国考古学史教程》(以下简称《教程》)出版在即,要求我在书前缀言以推介,令我很是惶恐,也让我不由得想起日常教学中的困扰。“为什么要学考古”“学考古有什么用”,这几乎是所有高校考古学教师需要直面的“灵魂之问”。长期以来,考古专业的学生,是各高校中专业思想最不稳定的群体,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包括我本人——进入考古专业都是高考录取“调剂”的结果。日常教学中屡屡遭遇这样的“尬问”,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学生的质疑,固然有个人诉求的因素,但更多是来自学科定位的迷茫。三十多年来,为了解开自己的心结,同时也为了给学生解惑,我一直在思考考古学科的使命与意义,为此也做过一些努力。

2018年,我担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在开学典礼上,我代表学院做了“考古何为”的致辞。我花了很长时间准备这篇致辞——既是为了给新同学解惑,也借机表达我对学科的新理解。我向同学们谈到,比起探索“考古为何”的具体知识答案,我们更需关切“考古何为”这一根本性话题,只有真正理解了考古学的初心与使命,才能生发出对考古志业的毕生追求与坚守。

在致辞中,我主要讲了三层意思,即回答“考古何为”,需要我们用学术研究和社会服务来回应“时代的声音”;需要我们在“古今中西之争”的激烈碰撞中重塑文明源流,重判文明价值;需要我们告别“考古学的贫困”,建立学科自我完善、自我创新的机制。致辞中的这段话,我至今仍觉得是可以给年轻同学以启迪的:

问题就是时代的声音,我们每一代人都是历史中人,都需要把握时代的脉搏,聆听时代的召唤,提炼出学科的时代命题,并作出自己的回应。回顾中国考古学的百年历程,从她诞生之日起,从来都不是枯守书斋的“神州袖手人”。从梁启超的“史学革命”到王国维的“古史新证”,从顾颉刚的“破坏之后得有新建设”到傅斯年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从李济追寻“中国文化的开始”到苏秉琦“六十年圆一梦”“修国史,写续篇”,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考古学早已与中国文明的现代化进程,与近代中国的跌宕起伏和救亡图存深深地缠绕在一起。考古学有如日光下的一滴水,映照出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

的辉煌，也饱含着中华优秀儿女探寻文明荣光和民族自强的艰苦卓绝。

很遗憾，这篇致辞虽不至于“无人喝彩”，但在学科范畴内也并没有激起什么波澜。转眼到了2021年，中国现代考古学走过了百年历程。这一年，考古学界举办了很多活动，但同仁们大多聚焦在考古学科的百年辉煌，而较少或不愿展开对学科发展的百年反思，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现在，这一缺憾将因为王立新老师这部《教程》的出版得以弥补。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学科史是由高校考古学教师而非考古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来完成，这绝非偶然——因为高校考古学教师不仅要传授“考古为何”之业，更要引导学生思考“考古何为”之道。正如王立新老师在《教程》“前言”中所强调，“从某种意义上说，了解学科发展史就是为了更好地创新”，对此我深表赞同。知其所长，才能明其所往——这正是梳理学科发展史的意义所在——未来中国考古学的创新发展，都需要回到本学科诞生的时代大环境和学科奠基人的初心宏愿。

著名近代史家陈旭麓先生敏锐地指出，近代中国的爱国主义有一个鲜明特点，那就是在抵抗外国侵略的这一基本要求下，必须有了解世界、学习西方的眼光和心思，把外国的好东西作为改造中国的借鉴。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于民族危亡之际，本质上是“救亡图存”的强国之学、报国之星——中国考古学的初心就是“爱国”！

1840年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造就了以林则徐为代表的“开眼看世界”的一批先觉者。1894年甲午大败，“成中国之巨祸”，举国震惊，故梁启超称，“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此后戊戌变法，企图吸取西学以变政。梁任公政学兼通，以学辅政，“维新”之际极力呼吁“史学革命”，强调“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这一时期，写出一部新的“中国通史以助爱国思想之发达”，是梁启超、章太炎等“革命儒生”以学救国的迫切之举。

作为一门自西方引进的学科，有关考古学的学科属性，长期以来学界颇有争议。但对于中国考古学而言，迄今最权威的界定，仍是夏鼐先生在《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首中的定义——“考古学属于人文社会科学的领域，是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正确定位不仅为新中国考古工作和考古学科的迅猛发展保驾护航，也是新时代构建中国考古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基石。

从学科史的维度来看，对现代考古学有引进奠基之功的首推傅斯年。在思想上，傅斯年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曾自我评价“我之性格，虽有长有短，而实在是一个爱国之人”；在学问上，傅斯年继承了梁启超“史学革命”的衣钵，致力于推翻旧传统的“教皇政治、方士宗教、阴阳学术、偈咒文学”，并以一己之力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发愿“要把历史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史语所的建立，融考古于史学，极大地“扩充了工具”“扩充了材料”，真正实现了梁启超“史学革命”的夙愿。

中国考古学草创阶段，是傅斯年“搭台”，李济、梁思永等人“唱戏”的学术架构。

李济自述在少年时代，“知道自己生于一个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国度里时”，便“常觉欢欣莫似”，表现出拳拳的爱国之心。1928年冬，李济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接受傅斯年的邀请，出任史语所考古组组长，并第一时间奔赴殷墟发掘现场。虽然此前李济的考古实践极其有限，但他很快就生发出借助殷墟遗物来“建筑一部可靠的殷商末年小小的新史”之宏愿。稍晚，在梁思永辨析出“后冈三叠层”之后，李济更是敏锐地意识到此发现在中国文明史上的重要意义，赞誉它“替中国建筑‘新中国上古史’的同志辟开了一个比较可靠的出发点，由此往前就可以渐渐地到那平坦大路”。追本溯源，李济的这些学术敏感仍然是继承了梁启超、章太炎等前辈学人“以史救国”的爱国初心。

梁思永选择考古学，并成为“中国第一位考古专门学者”，均出于乃父梁启超的安排。1922年，万国考古学会会长瑞典王太子阿道夫·古斯塔夫来华，时任中国考古学会会长的梁启超做了“中国考古学之过去及将来”的讲演，希望将来“全国高等教育机构均设考古学科，以期开辟中国考古学的新纪元”。梁启超相信，“以中国地方这样大，历史这样久，蕴藏的古物这样丰富，努力往下做去，一定能于全世界的考古学上占有极高的位置”。由于当时在中国从事考古相关工作的多是安特生、德日进、鸟居龙藏等外国学者，梁启超更希望中国学者自己“为中华民族在这一专业学问领域争以世界性声誉”。1924年，梁思永从清华毕业后，考入哈佛大学，主攻考古学和人类学。1930年，学成归来的梁思永初入史语所不久，就受傅斯年委派前往黑龙江昂昂溪遗址调查发掘，目的就是翔实的出土物证来揭穿日本人企图占领中国领土而疯狂叫嚣的“满蒙非中国领土”的谎言，是傅氏“书生何以报国”呐喊的生动写照。

新中国成立之后，以夏鼐、苏秉琦为代表的中国考古人自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更加坚定了考古学“用以宣传爱国主义，以便增进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自信心和民族自尊心”的学科抱负，积极探索“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具有民族风格、民族气派的中国考古学”的学科发展道路。本《教程》的主体就是总结分析新中国考古历程和取得的成就，并细分为：中国当代考古学的发展（1949—1966）、中国考古学的成熟（1972年—20世纪90年代中期）和走向世界的中国考古学（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三大阶段，这些都是把握学科演进内在理路和洞察学科发展大势的卓见。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写学科史和学术史，绕不开的总是代表性人物和代表性成果，这应该是中国传统学术史流行“学案体”的缘故。每一个时代标志性的学者，代表了这个时代的学术高峰；每一个学科的代表性人物，则代表了这个学科曾经达到的学术高度。如果要举出中国考古学百年史上最具标志性的学者，我想很多同行一定都会首先想到考古学一代宗师苏秉琦先生。

苏秉琦出身在一个富裕的工商业家庭。1928年，青年苏秉琦目睹国家破败，毅然“决心改学中华民族的历史以唤醒民众——教育救国，兴史救国。”20世纪30年代，刚刚投身考古事业的苏秉琦，念兹在兹都是“吾爱吾国，甚至把身心奉献，让国土和民族不至沉

亡，反得永生。”苏秉琦对学科的贡献是全方位的，他的个人学术成长史其实就是中国考古学演进史的缩影。从地层学到类型学，从考古学文化划定到区系类型理论提出，从古史重建到文明阐释，苏秉琦始终站在学科最前沿，引领中国考古学不断向前。对于苏秉琦先生在上述领域原创性、引领性贡献，《教程》都给予了专门而细致的论述，尤其有利于读者提纲挈领地把握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大势。

新中国成立伊始，年届不惑的苏秉琦对新社会充满了憧憬，很快就写出了《如何使考古工作成为人民的事业》这篇篇幅不长但意味深长的重要文章。他在文中写道：

假如我们不肯甘心永远处于落后的境地，假如我们还想使我们由西方新学来的一套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生根繁殖，假如我们还想成为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国家，像我们的先民一样，继续对于人类的文明生活有所贡献，我们就需要好好地保爱我们先民留给我们的这份珍贵遗产，从这里边去吸取经验，看他们是如何地发明和改进了农业和陶业，征服了森林，驯养了家畜，发明了文字、指南针、印刷术、火药，以及笔墨纸砚，看他们又是如何地由活剥生吃到煎炒烹调，由山洞土窑到楼台亭榭，从树叶兽皮到锦绣衣冠，由轮子的发明到机械的使用，然后我们再看这一切物质生活方面的发明和改进对于当时经济和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种种方面所发生的影响，这就是研究中国物质文化史的任务。这个任务，正如加里宁在苏联科学院二百周年纪念会致词中所说过的一句名言：“由群众中吸取他们的创造精神，再把人类征服自然的胜利结果还给他们。”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工作和任务。对于这个工作和任务的完成，考古学者的参加是不可少的。

苏秉琦后来进一步解释道，“五四运动前后，当国家、民族面临危机生死存亡的时刻，在社会上引起了一个热烈的思潮，就是讨论中西文化问题。那时候中西文化问题之所以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原因很简单，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古国落后了，落后的原因是什么？不能不从历史上来回答这个问题。”正是带着这样的思考，苏秉琦自觉地开启了从“为考古而考古”到“为历史而考古”的转变。

《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是苏先生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把“一生所知、所得，简洁地说出来”的一部“大众化的著作”。书的主旨，正如书名所示，是苏先生对“考古学科在探索中华文化、中华文明和中华传统起源过程中所走过的并不平凡的历程进行一番回顾。”苏秉琦一生事业的源泉，最根本在于他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这是我们读苏秉琦著作最直接、最强烈的感受。终其一生，考古从来都不是“避席畏闻文字狱”的避风港，也不是“著书都为稻粱谋”的工具，而是苏秉琦书生报国的一腔热情和赤子之心。

1997年1月，已届米寿之年的苏秉琦接受了香港《明报月刊》的四次专访，后以

“苏秉琦谈考古学的中国梦”为题刊出，此时距离他逝世不足半年。他说，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的运用、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中华文化的精神支柱与民族魂三大问题是他一生奋斗的中心。他始终坚信“考古学是人民的事业”，历经六十年探索而终于圆梦“考古学的科学化和大众化”。

1997年6月30日，苏秉琦先生永远离开了他钟爱的考古事业。此时，夏商周断代工程刚刚启动一年，这是一项由时任国务委员宋健同志倡导并推动，来自全国20多家单位近两百名学者共同参与的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也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冠以“工程”名称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课题。宋健同志强调“读史爱国，人人有责”，在目睹国际学界有关中国古史的种种浅薄认识后，他深为痛心，直言这“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中国历史学界自己的迷茫和纷乱”，遂有“快史学界之迟疑，怨众贤之蹒跚”，无奈“自编三代年表”的深深感慨和断然举措。

2002年，在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李伯谦等学者的精心筹划下，由夏商周断代工程办公室提出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项目在科技部正式立项，由此揭开了中国学者探究古老文明的新篇章。此后二十年间，在“预研究”的基础上，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先后实施了五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绩，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文明的阐释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考古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关心推动考古事业向前发展，中国考古学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期。2020年9月28日，十九届中央政治局举行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2021年10月17日，在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专门致贺信，希望广大考古工作者增强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发扬严谨求实、艰苦奋斗、敬业奉献的优良传统，继续探索未知、揭示本源，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展示中华文明风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论述充分体现党和国家对考古工作的高度重视和殷切期盼，深刻揭示考古工作学术性与政治性的有机统一，为新时代中国考古学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纵观百年考古学史，历经了救亡图存、振兴中华和民族复兴的三大发展阶段，蕴含着一代代考古人矢志不渝的爱国情怀。为民族写史，为文明立传，这是百年中国考古学的世纪梦想，更是一代代考古人的初心使命。新时代的中国考古人要以“两个结合”为根本遵循，秉持学科初心，怀抱学科梦想，勇担“考古释中华”的学科重任，在文明探索的道路上砥砺前行，作出无愧于学科、无愧于时代的更大贡献！

目 录

绪言	1
第一章 考古学及其与金石学的关系	5
第一节 什么是考古学?	5
第二节 古代中国有无考古学?	7
第三节 宋代以前的金石学	9
第四节 宋元明时期的金石学	13
第五节 清代与民国初年的金石学	17
第六节 考古学与金石学的区别与联系	24
第七节 中国考古学的学科定位	25
第二章 考古学在中国的兴起与初步发展 (1895—1949)	27
第一节 中国考古学兴起的社会与思想背景	27
第二节 中国考古学的兴起 (1921—1931)	40
第三节 中国考古学的成长 (1931—1937)	59
第四节 中国考古学的初步发展 (1937—1949)	76
第五节 20世纪上半叶中国考古学研究的总结	90
第三章 中国当代考古学的发展 (1949—1966)	94
第一节 考古事业的发展	94
第二节 主要考古工作与收获	97
第三节 研究的主要成就与理论取向	122
第四章 中国考古学的成熟 (1972年—20世纪90年代中期)	129
第一节 考古事业的新发展	129
第二节 主要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132

第三节 技术、方法与理论的发展	201
第五章 走向世界的中国考古学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	229
第一节 考古事业的新发展	229
第二节 主要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234
第三节 田野考古工作理念和手段的进步	320
第四节 新技术的应用与学科交叉	324
第五节 理论与方法的进步	331
第六节 对未来的展望	349
附：推荐阅读书目	353
后记	354

绪 言

任何一门成熟的学科都需要总结学科自身的发展史。不了解学科史就不知道这个学科是怎样来的,经历了什么样的发展阶段,目前处于怎样的研究现状,将来的走向与发展趋势如何。从某种意义上说,了解学科发展史就是为了更好地创新。

本教程旨在使中国高校考古与博物馆专业的硕士研究生能够系统了解中国考古学产生与发展的历史,尤其是考古学基本理论、方法与技术在中国考古学中的演进历程与发展现状,为研究生进一步把握未来中国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与目标,从而开展自身研究实践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编纂考古学史教程,既不同于以往出版过的一些考古发现与研究的材料集成,如《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等^[1],也不同于近年组织大量人力所编写的包含全国各区域、各专门方向学术史的《中国考古学百年史(1921—2021)》^[2]。后者是迄今有关中国考古学学术史的集大成之作,煌煌巨著,洋洋大观,然其并不适合作为教材。

坊间尚易购得的与中国考古学史相关的重要书籍有卫聚贤先生的《中国考古小史·中国考古学史》^[3]、阎文儒先生的《中国考古学史》^[4]、陈星灿先生的《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5]和王世民先生的《考古学史与商周铜器研究》《中国考古学编年史》等著作^[6]。其中《中国考古小史·中国考古学史》集录了卫氏撰成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考古小史》和《中国考古学史》两部著作。《中国考古小史》介绍了阮元、梁启超、王国维有关“考古史”的三篇著述及葛利普关于中国古生物学的一篇研究综述,并列举了周口店、仰韶村、西阴村、城子崖、殷墟、燕下都、汾阴后土祠、巨鹿宋城、明故宫等重要发现,以及外国人在中国境内早期考察活动的重要发现。《中国考古学史》一书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文物出版社,1979年。

[2] 王巍:《中国考古学百年史(1921—202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

[3] 卫聚贤:《中国考古小史·中国考古学史》,三晋出版社,2017年。

[4] 阎文儒:《中国考古学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5] 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

[6] 王世民:《考古学史与商周铜器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王世民:《中国考古学编年史》,中华书局,2024年。

则举要概述了由周代到民国早期关于古迹、古物的重要发现与研究成果，绝大部分内容是关于金石学的历史。此书尚有重印的单行本^[1]。阎书亦重在归纳和梳理自周代至民国时期有关“考古”活动和研究概况。金石学无疑也是该书关注的重中之重。值得一提的是，该书将20世纪上半叶的考古活动分为“非中国正式考古机关的考古工作”和“中国考古机关的考古工作”两部分，突显出中国考古机关逐渐成为考古主导力量的历史及特色。卫书与阎书均成书甚早，且所述内容也多偏重于金石学研究。二书对于考古学史的研究，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陈书对于中国考古学，尤其是史前考古学的萌芽、诞生与早期发展的历史作了十分细致、系统的综理，分析透彻，评判中肯，是关于中国考古学史研究的高水平论著，在学界备受推崇。可以说也是迄今全国各高校考古学史课程所开列的最为重要的参考书。王世民先生是目前国内从事考古学史研究时间最久、成果最为丰硕的大家之一。20世纪80年代初，他为夏鼐主编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撰写了“中国考古学简史”长条以及作为该书附录的“中国考古学年表”^[2]。之后，先生陆续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中国考古学史研究的论文及多位已故考古学家生平与学术贡献的综述，后收入《考古学史与商周铜器研究》一书的上编^[3]。其中“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这一部分，是在其为《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所撰相关词条的基础上，陆续扩充修改而成，材料收集截至20世纪90年代末。该书简明扼要，条理清晰，高度概括了21世纪以前中国考古学兴起与发展的历程和主要成就。王先生新近出版的《中国考古学编年史》，是在其早年所编“中国考古学年表”的基础上，融汇前书的“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并参考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学年鉴》系列的相关内容而集成^[4]。该书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划分为金石学时期、孕育时期、诞生时期、初步发展时期、全面发展时期、继续发展时期、新的发展时期七个阶段。自“孕育时期”（1901—1920年）开始，以编年体的形式介绍中国考古学发现与研究的重要史实。该书资料翔实，方便检索，对于了解中国考古学的总体发展历程与主要成就，无疑是一本好书。然而，上述王先生的两部著作，前者重在梳理“历程”，后者又聚焦整理“编年”，均很少涉及对各个阶段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发展状况的总结与评述。

此外，张政烺先生曾有《中国考古学史讲义》，是其1953年秋为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生开设中国考古学史课程的讲义，内容仅见金石学部分^[5]。在一些考古学概论或方

[1] 卫聚贤：《中国考古学史》，团结出版社，2005年。

[2]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考古学》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3] 王世民：《考古学史与商周铜器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

[4] 王世民：《中国考古学编年史》，中华书局，2024年。

[5] 张政烺：《张政烺文集·古史讲义》，中华书局，2012年。

法论的教材中,也见有考古学简史方面的内容^[1]。总体观之,以上各种相关著作,均有重要学术价值,然因种种原因,均不宜作为当今高校考古学专业学生学习中国考古学史的教材。

本教程的编纂,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考古学发展的分期节点完全依照陈星灿的《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将1895年至1921年春之前的相关考察活动及学术认识列入第二章“中国考古学兴起的社会与思想背景”一节(陈书称为“中国史前考古学的萌芽”),将1921年夏至1931年夏之前的阶段作为第二章“中国考古学的兴起(1921—1931)”一节(陈书称为“中国史前考古学的诞生”),将1931年秋至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之间的阶段作为第二章“中国考古学的成长(1931—1937)”一节(陈书称为“中国史前考古学的发展”),将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阶段作为第二章“中国考古学的初步发展(1937—1949)”一节(陈书称为“中国史前考古学的继续发展”)。至于将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作为一个单独发展阶段列为第三章,是依照林沅先生《中国考古学讲义》的做法。以上分期节点的选取颇具合理性,想必也能够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同。此后的中国考古学发展,我们大体分作1972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这两大阶段。起点选择1972年,是因为从这一年开始全国考古工作陆续恢复、高校考古专业从该年恢复招生或新办专业、国家级考古刊物陆续复刊等系列标志事件。之所以选择20世纪90年代末作为当今发展阶段的起点,是因为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所带来的联合攻关的工作方式变化、古DNA分析等新科技手段的全面应用、田野考古中区域系统调查的陆续开展及重要遗址发掘开始重视对布局结构的揭示等一系列重大变化。具体操作中,我们大致选定1998年作为起点年份。虑及相关研究案例的内容或行文的连贯性,少数研究案例的阶段归属难免略有参差。

在编纂过程中,我们遵循的一般规则是,从各阶段考古简报或报告中归纳当时获取材料与整理材料的方法与技术方面的信息,而从学术著作中归纳各阶段学人们所关注的问题、思潮与理论。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中国考古学史,一方面由于总体工作和研究认识有限,另一方面因有陈星灿等学者的归纳和总结工作,资料的收集和审校相对容易,不过已难形成新的认识。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考古学史,虽有不少公开出版的总结性成果,但大多是介绍各阶段、各区域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尚难说构成了“史”的梳理。尤其是关于理论、方法方面的系统总结、评述,并不多见,需要做大量归纳和分析工作。此外,尚有众多有关著名考古学家生平与成就的研究成果,需从中择取有重要价值的信息。固

[1] 如栾丰实、方辉、靳桂云:《考古学理论、方法、技术》,文物出版社,2002年;钱耀鹏主编:《考古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考古学概论》编写组:《考古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陈虹:《当代中国考古学》(第二版),浙江大学出版社,2024年。

然，每一阶段考古学领军人物的研究与学术成就能够代表时代特征，自然可以作为重点关注对象，但如果对众多“非著名”考古学人的著作视而不见，也难免失之武断。不过，教程尚简，虽尽力网罗自认为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著述、见解，然毕竟难以备举，挂一漏万，在所难免。材料丰富，也有选择的困难。因而，从微观把握，从宏观总结，努力厘清中国考古学发展的主脉，是本教程的目的。

在教程中，为了进一步明确中国考古学在某些理论、方法方面的创见，我们也对同时期国外学界的相关认识作了一些简单的介绍和比较。

还需说明的是，若要顺利完成本课程的学习，需要学生首先完整地学习中国考古学的通论课程及“考古学导论”“中国古代史”等课程，并应具备一定的田野考古知识和阅读古代文献的能力。

第一节 什么是考古学？

一、考古学的概念

“考古学”一词并非一成不变的概念。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的学人对其大概都会有不同的理解。

夏鼐是中国考古界最早为“考古学”这一概念给出定义的学者之一。而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夏先生自己就曾有几次不同的表达。正如有学者所注意到的那样，“这是夏鼐思考最多、最久的术语。他在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论文中，还在讨论考古学的定义”^[1]。其实，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一方面是因为考古学科的研究手段与研究对象始终在不断拓展。从世界考古学史的角度看，在考古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确立之前，无论东西方都曾存在过一个以古器物为主要研究对象的阶段。在欧洲，人们对古物的认识存在一个从神创的“圣物”（希腊-罗马时期）到人造物品即“文物”的转变。19世纪初，随着分类学、地层学等方法的逐步引入，人们认识到古物所出自的地层堆积与遗迹也是需要关注的。此后，又引入人类学的“文化”等概念，来描述研究对象的分类。伴随当代多学科手段的参与，人们又进一步发现还有大量古器物、古遗迹之外的信息可以获取，诸如孢粉、植硅石、大植物遗存、动物骨骼、人骨等各种各样的材料，可以做多方面的研究。可以想见，随着认识手段的进一步扩展，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仍会日益丰富多彩。另一方面，不同文化背景或流派的学人有不同的目标追求，对考古学的研究目标与学科定位的认识也会有所不同。

中国考古学界是普遍赞同将考古学视为历史学的分支学科的。相信大多数人都会认同罗伯特·沙雷尔、温迪·阿什莫尔的定义：“考古学就是通过实物遗存研究人类历史的一门学科”^[2]。那么，按照这一定义，古器物学是否属于考古学？这不仅与研究对象有关，更与研究手段和研究目的相关。如果出于收藏、鉴赏的角度研究传世古物，那显然

[1] 刘斌、乔辉：《夏鼐对中国考古学术语的贡献》，《文博》2024年第5期。

[2] [美] 罗伯特·沙雷尔、温迪·阿什莫尔著，余西云等译：《考古学：发现我们的过去（第三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页。

算不上考古学。如果出于“证经补史”的目的来研究古物呢？按照翻译过来的这一定义就很难说成熟的古物学或金石学不是考古学。而真正了解考古学的人都知道，考古学与其他学科最明显的差异，其实在于研究手段以及研究根本目的的不同。

按照欧美考古学通行的教科书去理解，基本可以将考古学概念重新定义为：考古学是一种通过田野及科技手段获取和分析实物遗存及相关信息，以研究人类历史为目的的一门科学。

二、考古学概念中包含的三个方面的信息

1.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包括实物遗存及相关信息。其中实物遗存主要包括与人类活动有关的遗迹、遗物，而与人类活动相关的遗物则又有人工遗物（陶器、青铜器、木石骨蚌器等）、自然遗物（动植物遗存、石料、玉料、矿石、颜料等）与人骨等。所谓相关信息主要是指采用自然科学手段经实验室处理所得到的信息，如人骨中所含的DNA与同位素、陶器内的残留物、石器上残留的淀粉粒、土壤的酸碱度及其中的孢粉、植硅石，等等。

2. 研究手段与途径

研究手段与途径主要是通过调查、发掘和检测等手段获取遗存和提取相关信息。

田野考古学及其中最重要的方法地层学、类型学与年代学，系由外国传入，是重要的获取与分析基础资料的手段，主要解决what\when\where等基础类问题，目的是使零散的考古资料得以系统化。

虽然地层学、类型学、年代学是很重要的方法，但不能排除其他方法的使用。诸如文化因素分析法（研究文化的源流与互动）、聚落形态研究、情境分析法、埋葬过程与墓地分析、墓葬等级分析法、文献史料对比分析、民族学资料对比分析，等等，都是考古学研究不可或缺的方法。不同的研究目的需要借助不同的研究手段。甚至大量的科技手段也可以不断地参与到考古学的研究中来。如陶土的成分测定、人骨的DNA分析等。地层学与类型学之外的这些方法，往往才是“透物见人”的关键，才有可能解释遗存究竟反映了人及社会的哪些方面，即回答how\why\why之类的问题。

3. 研究目的

当代考古学的研究目的，无疑是要尝试复原各个地区、各个时段人类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并尝试揭示人类文化与社会变迁的轨迹与发展动力问题。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复原”，只是走近历史真实的一种尝试。已逝的历史，恐怕永远不会因为我们的努力而真实地再现。

所以,总体来说,我们当代人理解的考古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手段与研究目的就与以往有了很大的差别。

但也有的学者对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与目标有不同的表述。如张忠培先生提出,“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认为考古学文化是考古学研究的对象”^[1],其目的在于研究“考古学文化所表述的这部分人类古代社会历史”^[2]。认为考古学文化的物质遗存仅是研究对象的资料、凭据。所以后来才又提出“考古学文化的文化”这一概念^[3]。

第二节 古代中国有无考古学?

一、相关争议

古代中国有无考古学?金石学或古物学可否划归考古学范畴?历来是有争议的。

考古学在中国出现不久,便有学者将其与中国传统的金石学相联系,认为二者虽有不同,却是同一门学问的发展。蔡元培在1929年出版的《安阳发掘报告》序言中即称,考古学在中国不是一门新学问^[4]。梁启超也明确提出,“考古学在中国成为一门专门学问,起自北宋时代”,倡导中国考古学未来的发展,一方面要致力于“旧方向的改良”,另一方面更要着眼于“新方法的引用”^[5]。卫聚贤在《中国考古小史》一书中,直接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分为春秋战国时代的“宝贵期”、汉至唐代的“祥瑞期”(除梁)、宋至近代的“研究期”(除元、明)和当代的“发掘期”四个阶段^[6]。此后,郭沫若、夏鼐、王仲殊、王世民等均认可金石学是考古学前身的说法^[7]。

在大学教学中,1979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编著出版的《商周考古》,就将汉

[1] 张忠培:《研究考古学文化需要探索的几个问题》//文物出版社编辑部:《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177—185页。

[2] 张忠培:《关于考古学的几个问题》,《文物》1990年第12期。

[3] 张忠培:《我对考古学文化的文化的认识》//张忠培:《中国考古学:永远在路上》,故宫出版社,2020年,第21—44页。该文系2014年在厦门大学的演讲稿整理而成。

[4] 李济主编:《安阳发掘报告》第一册,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29年。

[5] 梁启超:《中国考古学之过去及将来》,《重华月刊》1931年第1期。又见梁启超:《饮冰室合集·饮冰室专集之一百一》,中华书局,1989年,第1—15页。

[6] 卫聚贤:《中国考古小史》,商务印书馆,1933年。

[7] 夏鼐:《五四运动和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兴起》,《考古》1979年第3期;夏鼐、王仲殊:《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考古学》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王世民:《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金石学”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代以降的古物学研究视为传统的考古，而称之为“封建时代的商周考古”^[1]。吉林大学林沄先生最早讲授“中国考古学史”这门课程时，也将金石学或古器物学归入考古学范畴而称之为“中国传统的考古学”，而且将此章细分为“宋以前的考古学”“宋元明考古学”和“清代以来的传统考古学”各节作系统介绍。近年孙庆伟在总结新中国考古七十年发展历程与成就的文章里仍然主张：“考古学是中国传统史学的近代延伸，是根据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科学。”只不过将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催生的近代考古学称之为“科学考古学”^[2]。

然而，还有相当多的学者在谈到金石学与中国考古学的关系时，并不认为二者存在直接的继承和发展关系。李济认为，金石学与考古学的关系恰如“炼丹学之与现代化学；采药学之与现代植物学。炼丹采药，自有它们在学术史上的价值，然而决没人说它们就是化学或植物学”^[3]。苏秉琦在1950年曾指出，“考古学并非金石学的发展”。只不过后来又称“这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4]。20世纪80年代中期，俞伟超在《关于“考古地层学”问题》一文中指出，“在我国古代，也有某些地理学家、历史学家、旅行家记录古迹的行为。这到北魏郦道元著《水经注》时已经很突出了；后来，并一直继续不断。但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这种工作看成是我国考古学的直接前身，因为我国的近代考古学并不是由这个途径直线发展而成的。欧洲的近代考古学则是从这种工作发端，再结合其他学科的方法而成长起来的”^[5]。并且提出，“可以说是有了地层学和类型学，考古学才真正从传统史学中分化出来，成为一种利用古代遗留的实物资料来恢复人类过去时代面貌的科学”^[6]。显然，在他看来，作为中国传统史学组成部分的金石学，并没有靠自身完成向考古学的转变（但是，俞伟超在1992年与张爱冰联名发表的《考古学新理解论纲》一文中，则又称，“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前身是金石学，西方近代考古学的前身是古物学”，不过仍然强调“金石学和古物学并未直接导致近代田野考古学的发生”^[7]）。其实，即使是认可金

[1]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年。

[2] 孙庆伟：《中国考古学七十年》，人民网，2019年8月13日，<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9/0813/c40531-31292460.html>。

[3] 李济：《现代考古学与殷墟发掘》//李济：《安阳发掘报告》第二期，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0年，第405页。

[4] 苏秉琦：《如何使考古工作成为人民的事业》//苏秉琦：《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277—283页。

[5] 俞伟超：《关于“考古地层学”问题》//俞伟超：《考古学是什么——俞伟超考古学理论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3页。

[6] 俞伟超：《关于“考古类型学”的问题》//俞伟超：《考古学是什么——俞伟超考古学理论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56页。

[7] 俞伟超、张爱冰：《考古学新理解论纲》，《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又见俞伟超：《考古学是什么——俞伟超考古学理论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69页。

石学是中国考古学前身说法的学者，也并不否认以田野考古为基本特征的近代考古学是由欧美传入的事实。夏鼐就曾指出，中国的近代考古学，正是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才兴起和成长起来的^[1]。我们编著的《夏商周考古学》教材中，也主张金石学与考古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二者分属于不同的学科范畴^[2]。

二、争议产生的原因

之所以会出现以往这些不同的看法，主要在于对“考古学”这一学科的概念理解不一致。如果仅仅强调研究对象“遗存”和研究目的“历史”，将考古学定义为利用遗存（包括传世品）来研究历史的一门学问。那么，宋代以来形成的金石学无疑就可以归入考古学的学科范畴。因为金石学研究的金石碑刻之类无疑属于“遗存”的范畴，而相当一部分金石学的研究成果又起到了“证经补史”的作用。但是，如果认识到田野考古是现代考古学主要的获取与分析基础资料的手段的话，那凭借对传世品及其铭刻的研究作为主要学科支撑的金石学，显然就不应归入考古学范畴。况且，现代考古学的学科目的已远远不止是证经补史，而是复原乃至重构古史体系。

不过，也无法否认中国考古学与金石学两个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乃至部分内涵的发展传承关系。以下即从金石学的发展分析这门学科的特点及其与现代考古学的关系。

第三节 宋代以前的金石学^[3]

一、对古物的收藏与研究

在中国，对古物的收藏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

安阳殷墟妇好墓^[4]、三门峡虢国墓地虢仲墓（M2009）^[5]、韩城梁带村芮国墓地^[6]等处

[1] 夏鼐：《五四运动和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兴起》，《考古》1979年第3期。

[2] 井中伟、王立新：《夏商周考古学（第二版）》，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9、10页。

[3] 以下第三至五节内容，材料来源除专门注出者外，部分参考林沅《中国考古学史讲义》与张政烺《中国考古学史讲义》（见《张政烺文集·古史讲义》，中华书局，2012年）。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图版一六四。

[5] 河南省考古研究院、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门峡市虢国博物馆：《三门峡虢国墓（第二卷）》，文物出版社，2023年，图版二五七。

[6]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渭南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韩城市文化旅游局：《梁带村芮国墓地——2005、2006年度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20年，第130页。

都曾出土过新石器时代晚期红山文化的古玉；长安沣西西周墓^[1]和曲沃羊舌墓地^[2]均出土有石家河文化玉神人面像，表明商周时期有些贵族就有收藏古物的爱好。

到了汉代，这些传统得以继承下来。例如南昌老福山西汉木椁墓中随葬有商代的青铜器^[3]，西安三店村西汉墓中随葬西周晚期铜盃与春秋之际的甬钟^[4]，衡阳蒋家山东汉砖室墓随葬商末周初的铜觶、爵^[5]。近年南昌西汉海昏侯墓中又出土了西周早期凤鸟纹提梁卣^[6]，显然都是被墓主人作为古董来鉴赏和收藏的。所不同的是，自汉代以后，一些学者们对古物不仅仅满足于收藏鉴赏之需，而且开始了对“前代之古文”的著录、释读，乃至对文字流变与器形的考证。

《汉书·武帝纪》有元鼎元年和四年两次得到出土宝鼎的记载^[7]。宣帝时扶风美阳出土尸臣鼎，张敞将其铭文释读为“王命尸臣：‘官此栒邑，赐尔旂鸾、黼黻、珣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对扬天子丕显休命”^[8]。班固《汉书·艺文志》曾著录《黄帝铭》6篇、《孔甲盘盂》26篇，所记应当就是先秦铜器及铭文^[9]。可惜已亡佚。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说：“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10]。他不仅关注铜器上的铭文，还利用保存在《仓颉篇》《史籀篇》等文献及铭刻中的古文来研究文字的流变。

东汉郑玄为注释“三礼”（指《周礼》《仪礼》和《礼记》），曾考证过三代礼器的式样，而专成《三礼图》一书。该书已亡佚，目前所见为五代末、宋初聂崇义的重编本^[11]。其中所绘制的商周古器，大多与原物不合，很可能多半出于主观臆测。曹魏、西晋时期，王肃和刘杳还曾分别根据山东古墓中所出牺尊、象尊之形驳斥汉儒郑玄关于此二器类的解释，“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12]甚至也有学者利用碑刻材料来补充或订正史籍记载。如，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镐工作队：《1984—85年沣西西周遗址墓葬发掘报告》，《考古》1987年第1期。

[2]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曲沃县文物局：《山西曲沃羊舌晋侯墓地发掘简报》，《文物》2009年第1期。

[3] 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西南昌老福山西汉木椁墓》，《考古》1965年第6期。

[4] 朱捷元、李域铮：《西安东郊三店村西汉墓》，《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2期。

[5] 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衡阳苗圃蒋家山古墓清理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6期。

[6]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铜器》，《文物》2018年第11期。

[7]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99年，第111—152页。

[8]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99年，第993—1050页。

[9]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99年，第1311—1450页。

[10] （汉）许慎撰，（宋）徐铉校订：《说文解字》，中华书局，2013年，第321—323页。

[11] （宋）聂崇义撰，丁鼎、孙蕴校释：《新定三礼图》，中华书局，2022年。

[12] 张政烺：《张政烺文集·古史讲义》，中华书局，2012年，第332页。